

试析婉儿形象及其悲剧意义

陈建水

(雷波县委 宣传部,四川 雷波 616550)

【摘要】婉儿是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作品《浮城》中的悲剧女性。作品围绕女主人公婉儿的“抗争”展开故事情节,从人性的角度揭示了造成婉儿悲剧的社会原因和“浮城”毁灭的必然性,进而凸现了婉儿形象的悲剧意义。

【关键词】梁晓声;《浮城》;婉儿形象;悲剧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2-0049-03

《浮城》是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创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部长篇小说。婉儿则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沿海城市“享乐型”女性的典型,是受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侵蚀的牺牲品。作品采用荒诞现实的手法,成功地虚构了“浮城”这一偶然事件,塑造了婉儿这一悲剧女性形象。本文试图对婉儿形象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悲剧意义。

一 婉儿形象分析

婉儿是一个悲剧性“小人物”,其“抗争”正是“‘小人物’的抗争”^[1]。她的命运悲剧与其悲剧性性格特征密不可分。纵观整个作品,婉儿性格特征的形成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城市与大陆架断裂,到教堂余生

这一阶段,婉儿的性格特征表现为:厚颜无耻,不惜出卖肉体 and 灵魂;有重新做人的要求,不记仇、有同情心、讲仁义。一方面,她认为出卖肉体也不过是一种“活法的选择和确定”,也不过是“想出国,和几个可能将她带出国的中国男人或外国男人睡过觉。”她信仰上帝,曾到教堂忏悔。甚至产生了给上帝生一个儿子的奇怪想法,但又深感自己的罪孽,因而不敢再去教堂。另一方面,她又不记仇、有同情心、讲仁义。街坊二铁强暴了她,她用花盆砸伤了已下楼的二铁。

看到二铁妈可怜,她就没有再深究二铁的责任。她还能自觉遵守仁义街“仁义”的道德准则。逃命之际,她还忘不了叮嘱孟祥大爷,托他转告李奶奶“浮城”的消息。她不记仇,即使记仇时间也不会太长。她一生中只对一个人记恨最久,那就是上帝。

第二阶段:从教堂余生到替“哥”报仇

随着重新做人希望的唤起和受挫,其性格特征表现为天真、善良、机灵,报恩心快和复仇心切。

城市断裂了,人们恐慌地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婉儿象“浮城”上众多的人们一样,无所依托地逃到了市中心的基督教堂。然而海鸥却越聚越多,并向人们展开攻击。婉儿被吓得昏死,幸而被修自行车的个体户赵晓坤救出。车铺内,婉儿和赵晓坤同海鸥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这次死里逃生,婉儿才明白赵晓坤救她不是为了占便宜。她被感动了,第一次懂得了真爱。遇上赵晓坤,正是婉儿“金盆洗手”重新做人的一次重大转机。

当人们得知“浮城”正向日本漂去时,不少的人都希望能够去刷盘子。婉儿不想去,现实让她感到:无论中国或日本,只会使自己更加肮脏。到日本沦落到妓院,由业余的变成专业的就惨了,又不自由。她决定同“哥”一起去闯,一同过几年清苦的日子,自己也要找份工作干。

她孑然上街寻找小红夫妇,以报答孟祥大爷送她救生圈的知遇之恩。在机场候机室里,婉儿找到了小红的丈夫广志。然而广志已一无所有,更不想

收稿日期 2007-02-10

作者简介 陈建水(1968-),男,四川屏山县人,雷波县委宣传部干事。

有婉儿这个拖累。婉儿机智地引出了广志跟她走。在晓坤收留广志之际，婉儿被广志的豪言壮语所感动并原谅了他。她想：“钱，即使美元，也难买到‘同舟共济’四个字……人在咋然落魄之际，说几句荒唐话，作出些荒唐行为，不是很应该的么？”

为了到日本后能够独霸十几万美金，广志趁婉儿上街买酒菜之机谋财害命杀死了晓坤。婉儿痛不欲生，希望破灭了，她的重新做人遭到了“金盆洗手”后的第一次致命打击。混乱中她寻机杀死了广志，替晓坤报了仇。

第三阶段：报仇后被女大学生许雁南所救，到许雁南的死

这是婉儿命运的又一转折点。其性格特征表现为善良，内疚而又任性。但对社会的认识是肤浅的，不惜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容易上当受骗。

婉儿替“哥”报仇后昏迷街头，被女大学生许雁南救回学校。她怕再次受骗，因而骗了许雁南后又立即感到内疚：“不，姓赵。”她要象“哥”那样去生活，去通过辛勤的劳动自食其力。是的，她忘不了赵晓坤，更忘不了在人们眼中自己早已无名无姓。姓赵，已成了婉儿生命中的最后依托。许雁南不仅收留了婉儿，还安排时间教她学知识。遇上许雁南，是婉儿的幸运，也是她命运的再次转机。婉儿虽在社会上晃荡过几年，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但认识肤浅。这一阶段，她更努力地与命运抗争。然而，重新做人与“浮城”之间的矛盾，客观现实与主观自我之间的矛盾，更进一步地将婉儿的命运推向了毁灭的顶峰。

她崇敬同海鸥战斗死去的人们，也怀念她的“哥”。许雁南带头为与海鸥战死的大学生捐钱修纪念碑，婉儿请求许雁南替她捐，并表示今后可以不吃菜。她告诉许雁南：“这算我对一切在这场死难中的人，表达我婉儿的一份心情了，包括那个不知姓名的‘哥’……他原来也是位研究生啊。”

她开始变得任性起来，与许雁南争吵并不听劝告，溜出去参加了大学生闹剧式的“革命”。游行中，她回答学生“领袖”贾晓光：“我真心实意拥护你们就是了”、“公社……会给我一份好一点儿的工作干么？”她多么急于“新生”啊！当她得知大多数的人只是陪着散散步时，婉儿觉

得自己被“嘲弄”和“伤害”了。但她坚信这一“壮举”，并背着“社员证”到处分发。在街上，婉儿所在的队伍同“刷日本人盘子”的队伍发生了冲突。从学校赶来寻找婉儿的许雁南，被驱散人群的警察走火打死。婉儿的全部希望，因许雁南的死而彻底破裂了，精神也随之完全崩溃。

第四阶段：从许雁南的死，到婉儿的死。

这一阶段，是婉儿的最终毁灭，也是婉儿形象升华和悲剧命运的最后阶段。

作品中，这一部分着墨不多。不外乎就是许雁南的死，使婉儿近乎疯了直至完全疯了。日本筑起了一道冰坝，人们刷日本盘子的梦破裂了。已“疯”了的婉儿，仍免不了遭到厄运，她被十几个丧失了人性的男人集体强奸了。“浮城”已成废墟，婉儿被中国军舰救起，荒乱中跳海了却了自己的一生。

无论是遭到集体强奸前，还是跳海前，她都在不停地唱着同一首歌：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可以说这首歌，是她彻底毁灭和将疯时的瞬间顿悟。正是有了婉儿毁灭前的这种顿悟，进而升华了婉儿形象及其悲剧意义。

二 婉儿形象的悲剧意义

婉儿这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现代“享乐型”女性，其信仰、生活方式以及人生态度，是应该受到批判的。“浮城”事件发生后，她能不断地同命运抗争，且几欲重新做人，都应该得到肯定。她希望能重新做人，而现实却不可能让她如愿以偿。这种矛盾的抗争，最终导致了婉儿的悲剧性毁灭。毋庸置疑，婉儿的抗争是属于“悲剧性的抗争”。

造成婉儿悲剧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其一，社会因素，亦即“社会悲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引进了国外不少于国于民有利的东西，出现了许多新生事物，但也伴生繁衍了象婉儿这样的“癌细胞”。西方思潮的大量涌进，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挑战；国人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意志不坚定者则变成了“俘虏”。

个人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是造成婉儿悲剧的重要社会因素。在思想上，大家一切都向钱看，因而容易受到金钱和物质的诱惑。有的崇洋媚

外，认为外国特别是美国什么都好，月亮又圆又大，遍地是黄金，一出国就会立即富起来就会上天堂。为了出国，有的不惜出卖人格国格。婉儿就是这个畸形群体中的一个。正如作品指出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城市，仿佛平地长出一片蘑菇似的，繁殖出许多像她这样的姑娘。不，她们也许从来不曾是姑娘，她们大抵从妙龄少女一下子就变成了成熟的女人。她们零售或批发自己，并非被生活所迫，而是被自己所迫。”

其二，家庭因素。父亲早逝，母亲忙于为生活操劳，导致了婉儿从小就缺乏家庭温暖和起码的家庭教育，这是造成婉儿悲剧的家庭因素。

其三，“性格悲剧”因素。偶然事件——“浮城”的发生，为婉儿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悲剧的可能性，并加速了婉儿命运的悲剧进程。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因此，造成婉儿悲剧的因素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亦即“性格悲剧”因素。一方面，她自甘坠落。上初一时便大胆地给班主任老师写情书。十七岁初三复读时，便主动勾引了包子铺老板。当老板娘双双将他们抓获时，她还觉得老板娘好笑。从此，她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堕落，只为了能够出国。另一方面，婉儿不能正确认识社会的复杂性。虽有

初中文化，但她却不知道传说中的白素珍是谁。按理，遇上赵晓坤应是她自身命运的重大转折。正是由于婉儿未能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没有认识到身在“浮城”所面临的危险，再加上她的善良和幼稚，导致了晓坤的遇难和自身悲剧的提前到来。这一点是婉儿事先未曾到也不可能想到的。遇上许雁南，本该是婉儿命运的又次重大转机。但是，急欲“新生”的她已变得任性起来。不听从许雁南的劝告，争吵后跑上街去参加“革命”。可以说，作者对婉儿的命运给予了充分同情，但同时又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2]，即便事实上是“不会争”，也“不能争”。许雁南的死，又使她失去了“浮城”以来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亲人。而遭致灭绝人性的强暴，才是婉儿苦苦抗争后彻底绝望和“真疯”的重要因素。

婉儿命运的悲剧，深刻地提示了西方思潮侵袭、传统文化沦丧、拜金主义以及个人享乐主义蔓延的危害性。从而昭示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大力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此外，婉儿的命运还表明，个人命运只有立足于现实的土地，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辛勤劳动，才能谱写出更加美好的现实人生。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计永佑，吕香云. 美学探索[M].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

[2] 鲁迅小说选[C]. 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Wan 'er and Her Tragic Meaning

CHEN Jian - shui

(Propaganda Unit, Leibo Committee, Leibo, Sichuan 616550)

Abstract: Wan'er is a tragic female in *Floating City* written by Liang Xiaosheng. Going around the struggle of Wan 'er, this novel discloses the social reason that causes the tragedy of Wan 'er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ending up of "floating city" so as to stick out the tragic meaning of Wan 'er 's image.

Key words: Liang Xiaosheng; *Floating City*; Wan 'er 's Image; Tragic Meaning

(责任编辑：张俊之)